论原始农业对原始音乐文明形成的影响

徐　飞

（中国科技大学社科部，　合肥，　230026）

摘　要：*原始农业对人类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新石器时期的出土音乐文物分析，探讨了原始农业对原始音乐文明形成的影响，提出音乐文明可能是在农业文明影响下最先发育的文明因素的看法，并对未来的深入研究提出了初步的建议与设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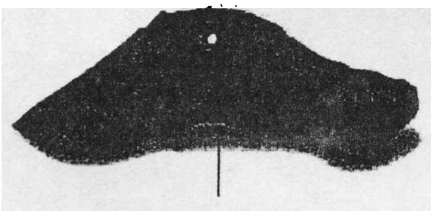
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人类文明就开始曙光初现，在这一时期，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石器。某种意义上说，石器的发明也创造了人本身。农业的起源，几乎和人类劳动的历史一样久远，也是人类文明最先发育的一个分支。由于农业文明的不断发展，人类才得以不断摆脱原始生活状态，进入更加文明的新的历史阶段。

考察原始农业对人类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有助于我们从本质上认识人类文明演化的具体过程。在此项研究中，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原始农业对原始音乐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从现有的考古发现来看，音乐文明可能是在农业文明影响下最先发育的文明因素，本文将对此作一初浅探讨。

一、一个值得重视的考古事实

中华文明发端于距今一万多年的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是：磨制工具的使用，农业文明的产生和陶器制作的普及。这三大文明活动其实都是围绕农业这一文明活动展开的，和农业文明密切相关的另外一个文明因素——原始音乐也在劳动的刺激下发育起来。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表明，中国原始音乐的起源，几乎具有和农业起源同样悠久的历史，舞阳贾湖骨笛最早可上溯到距今 9 千年，其发育程度比原始文字、原始绘画、原始宗教都要先进。因此，深入研究原始农业与原始音乐形成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助于我们全面揭示中华文明演化的奥秘。

更近一步的检索使我们发现，几乎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原始乐器的形成，很多都和人类的劳动工具密切相关。典型的如 1983 年出土于河南禹州范石乡阎砦遗址的石磬，这具石磬通长 78 厘米，高 28.5 厘米，厚 4.5-5.5 厘米，用青石打磨而成，未加磨光修正，但从外形看，一半被精心打磨形成较为锋利的锋刃，另一半则明显构成适合手握或捆绑，从形制上看，这一石磬，几乎是人类劳动工具转化为乐器的一个中间过程的“活化石”；它显然是从石刀、石犁变化而来，但中间的一个悬挂用的小孔，则明白表明这应该是一件乐器；或者，至少可以被当作乐器来使用。因为，这个小孔也可以被穿上绳索由另外一个人牵引，用来犁田。但当它平时被保存不用时，悬挂起来，不经意间被人敲击发出声响，人类的第一个打击乐器——石磬也就此诞生了。



因此，有必要对原始乐器与原始农业的关系作一初步分析。

二、关于原始音乐起源的主要推测

从古至今，人们一直十分关注原始音乐的起源问题。并对这一问题作了种种推测，较具代表性的说法如《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校山林溪谷之音以歌。”这是认为音乐起源于对自然界声音的模仿;至于音高标准的确立，《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则认为是“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听凤凰之鸣，以制十二律。”将音高标准来源归结为听鸟的鸣叫。此外还有将音乐的起源归之于古代巫术、动物本能或情感的表现欲望等等，所有这类推测都有其合理性，但都仅仅是一个方面的推测，不能全面说明音乐的起源以及音乐文明与相关其他文明的关系。更缺乏直接的考古学实物证据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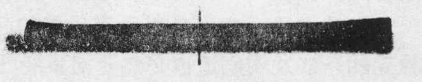
应当说，以人的自然嗓音作为发声器而出现的原始歌谣，应当是人类音乐的最原始的形态，人们在劳动生产的过程中发出的呼号，直接可以转化为音乐的节奏和音调。劳动发展了人猿祖先的双手和其他肌体；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特征就是其社会性，社会性的劳动发展了早期人类的喉部、口腔器官，“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了语言，(《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511 页。)，劳动和语言的交互运用，促进人脑的发达，直接为音乐艺术的产生准备了主观条件——即人类通过劳动，从生理机能上发育成熟，具备了欣赏音乐的可能性，甚至逐渐转化为主动或直接的现实性要求。其实，某些动物也对音乐刺激具有积极反应，有实验表明，在养鸡场播放特定音乐，可以刺激产蛋。可以设想，人类在巨大的原始劳动推动下，必然也会产生对音乐的强烈渴求，甚至直接造就了原始音乐的发端。据《淮南子》记载“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动力之歌也。”，这表明两千年前，人们已经注意到有些歌曲就是出于劳动的呼声。

当人类进入农业文明的时候，音乐文明也几乎同时孕育成熟。《吕氏春秋》记载的上古传说就有“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逐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这表明，在人类刚刚开始动物驯养和植物种植的时候，就开始了音乐的实践活动。这一时期，人类的音乐活动不仅表现为欣赏，也开始探索音乐的实用价值，比如，《吕氏春秋》载“昔古朱襄氏之治理天下也，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当然，造五弦琴是无法求雨的，单毕竟是人类对征服自然的一种试探，试图从中找到某种沟通自然规律的办法来，这个愿望是宝贵的，其创意也是使得赞赏的。

然而，上述讨论毕竟不足为凭，其依据仅仅是古代文献中记载的一些传说。能够使我们真实面对历史的，还是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种上古音乐文物。这些文物，也将成为我们探讨原始农业对原始音乐影响的主要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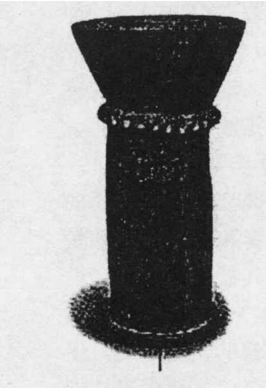
三、原始农业影响原始音乐的主要证据

据音乐考古专家研究，新石器时期的乐器，总的来说，同当时的生产技能、磨制技能、听觉审美要求以及宗教活动有关。主要乐器包括，陶制、石制或骨制乐器，典型的有骨笛，骨哨、石磬、陶谷、陶钟、陶铃、陶埙等。如前所述，石磬的出现显然和农耕、狩猎活动中的石制工具石犁、石刀有关，而各种陶制乐器，也和当时整个陶器文化的发展有关，陶器文化实际上也是原始农业文化的一个表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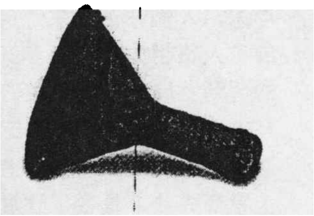
为此，不妨对新石器时期的乐器文物作一基本考察。

首先，是贾湖骨笛。关于它的音乐成就，已有专文论述，这里值得提及的是其制作材料，出土的 20 多只骨笛都是用丹顶鹤的尺骨制成，这说明贾湖骨笛产生的时代，人们已经可以较为随意地捕捉到丹顶鹤，这也从一个侧面反应了当时的渔猎技术；而骨笛的钻孔技术则直接反映了当时人类劳动的精细程度，没有恰当的工具和纯熟的技艺，是无法在骨笛上开出如此精密的小孔的。贾湖骨笛应该是劳动产生音乐的第一个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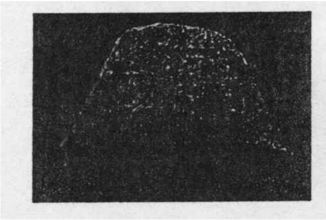
再看左边这件 1975 年出土于河南内乡朱岗仰韶文化遗存的陶鼓，从形制上看，还没有完全摆脱农业用具的痕迹，将其直立，完全可以作为盛放种子的容器。

据《礼记·明堂位》载："土鼓、蒉桴、苇龠，伊老氏之乐也。""夏后氏之鼓足"这是说一种土制的鼓，可以用草扎成的鼓槌敲击。夏后氏有一种鼓是有足的。这一出土文物，使这些文献记载得到一定程度的映证。因为这具鼓的鼓体未塑有可供悬挂的环，因此，应当是直立于地上敲击发音的，故称有足。作为对比，1985 年出土于甘肃兰州永登乐山坪遗址的陶鼓就演变的更为成熟了。一端呈外向扩张的喇叭口，在其外延有等距乳钉用于牵引并绷紧鼓皮，另外一端呈现圆筒状，整个鼓腔中空，两端近口处塑有宽带环形耳，用于悬挂鼓体，从声学原理看，其发音效果显然优于放置地面打击的土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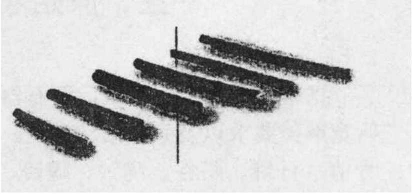
最能体现农业工具向乐器转化的例证，当属石磬了。《尚书·益稷》就有"击石拊石"；《礼记·明堂位》也有"叔之离磬"的记载，离磬指的是几个磬编排成一组的石磬，这种磬，已经从单纯的打击，开始向旋律化演奏演变。事实上，远古的先民在进入农业文明之前，曾经经历过极为漫长的石器时代，人们也许偶尔会发现被打磨的石制工具可以发出清亮悦耳的声响，进而逐步自觉地在生活中、娱乐中加以运用，并使之完善化，但这种需求，应当是发生在农业文明起源，人类温饱有了最低限度的满足之后，而禹州石磬就是原始农业对也是音乐形成的一个绝妙的注解，它默默地向我们诉说着某些农业实用工具是如何演化成最原始乐器的。

这件东西，如果不是这个容器的底部开有并列的穿孔，我们完全可以将其当作一件用于原始农业生产的容器，但其底部的穿孔显示，这是一件新石器时期的陶铃。原出土于湖北天门县石家河。可以想象，在最初制作陶碗时，一定会出现一些底部穿孔的废品，好奇者将底部的孔穿上绳索，吊挂铃舌，最初的陶铃创意也由此而发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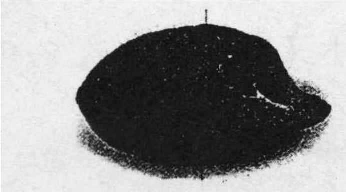
以上我们看到的是由劳动工具或生产用具演变而来的乐器例证，其实，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乐器的发明本身也极可能是源于某种生产实践的需要。河姆渡出土的大量骨哨可视为这样的代表。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哨距今约 7000 年。河姆渡文化属于稻作文化，渔猎也较为发达，据专家研究，这类骨哨可以逼真模仿鸟叫，因此人们推断这些骨哨应当是一种用于狩猎诱捕禽兽的拟音器具，当然平时也可以当作乐器吹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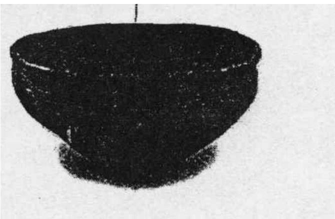


原始乐器表现出的功利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兼备的双重文化价值，使我们即使远离那个时代，仍然可以据此推测原始农业在人类文明形成过程中的独特作用。

如此讨论，并不是说所有乐器的起源都和农业有关，随着人类音乐文明的不断进步，独立的乐器发明创造也必然要同步展开，陶埙就是这类乐器的代表。



随着农业文明的不断进步，人类的生产力水平也不断提高，这也必将影响特定形态的原始音乐文明的同步进化。这具陶盆（1973 年出土于青海大通县，距今 4500 年左右。）上绘制的人物乐舞图，形象的反映了当时先民丰收后载歌载舞的情景，此时的音乐舞蹈艺术，也伴随农业文明一道，逐步走向初步的成熟了。



尽管我们见到的新石器时期出土的乐器还不太多，但就目前的例证分析，原始农业对原始音乐文明，特别是原始乐器的发明，具有直接的作用。本文仅仅试探性地提出了这样的设想，以期抛砖引玉，引起更多专家学者对此一问题的关注。

四、结语：未来研究的若干设想

音乐文物具有其它文物不同的文化特征，某些乐器的发音频率虽历经千百年，但今天我们依然可以检测复原，因此也使我们更多的获得了关于古代文明的信息，并由此反演当时的文明发展状况。音乐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专有形态，其近万年的演化发展，必然地构成了中华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篇章。某种意义上说，农业起源对中华文明形成的影响，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直接导致了音乐文明的产生与发展；音乐文明的进步，反过来也必将推动农业文明的继续发展。从而最终构成了以农业文明为主导，以音乐文明为特色的中华文明发展主线。现代科技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充分运用各种技术分析手段，对原始农业文物样本和原始音乐文物样本进行更为细密的分析，比如制造材料对比、原料来源分类、制作工艺比较等等，原始农业影响原始音乐的具体细节机制定会更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参考文献

1. 修海林、王子初：《看得见的乐器》，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
2.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1 年版。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4. 张居中等：《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